

发扬优良传统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而努力

——谢道渊* 在建馆八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北京大学图书馆从它的创立到现在，已经八十年了。今天我们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这里开这个纪念会，有这样多校内外的领导同志、知名学者和读者代表参加，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代表我馆全体同志对各位领导同志、各位来宾和广大读者经常关心、支持我馆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一八九八年，清王朝开办了京师大学堂。一九〇二年京师大学堂创建了藏书楼，调取了各省官书局出版的经、史、子、集及强学会的藏书，采购了部分中外文新书，藏书共七万八千多册。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一二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藏书楼改称图书部。一九一七年七月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李大钊同志担任图书部主任，李大钊同志在职期间，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着力于图书馆的整顿、改革和扩充，为将旧式的藏书楼改造成为近代的图书馆奠定了基础。当时藏书发展到二十万册，至今我馆尚存有当时购进的英、日文马恩全集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它学术著作。当时还建立了时事报刊阅览室。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这是我馆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一九三〇年北大图书部改称北大图书馆。一九三五年沙滩新馆建成，可藏书三十万册，有四百个阅览座位。抗日战争开始后，北大南迁，图书馆藏书全部陷入沦陷区。一九三八年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藏书只有四万多册，馆舍极为简陋，夏季下大雨时，学

生有时要打着伞看书。一九四六年北大迁回北京，北大图书馆恢复工作。解放前夕，藏书为七十二万册。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这是我馆历史发展的根本转折。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文、理科合并，我馆藏书合共达一百一十多万册。解放以后，我馆大力扩充了马列主义藏书，加强了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兴学科的藏书，读者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对北大图书馆是十分关怀的，周总理在一九五六年就曾指出：北大要有一个象样的图书馆。一九七五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建成了现在的馆舍，建筑面积达二万四千五百平方米，拥有大、中、小型阅览室三十个，共有两千多座位，还有十六个研究室。十年内乱期间，北大图书馆受到很大的摧残和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图书馆着重整顿基础工作，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着手现代化的起步。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曾为北大图书馆题字，这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和鞭策。目前北大图书馆藏书已有三百五十万册，每年进书量十万册左右，还藏有中外文过刊二万多种，旧报纸二千一百多种，每年订购加上赠阅的报刊共有七千二百多种。流通量一九八一年为一百一十多万册。八十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由一个小小的藏书楼，发展到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主义大学图书馆，当前正处于由近代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过渡的新时期。综观八十年的历史，北大图书馆在解放前的四十六年里可谓历尽艰辛，其间屡次遭到反动统治者和

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破坏，虽有本馆工作人员努力工作和校内外人士的支持，发展仍很缓慢。在解放后的三十四年里，虽受到十年内乱的挫折，但其发展速度却是过去四十六年所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们能今天的北大图书馆，首先应归功于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归功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北大图书馆的发展，也是由于得到了广大读者和社会人士的支持，我馆的馆藏中有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赠书，如巴金、叶圣陶、许广平、曹靖华、翦伯赞、向达、饶毓泰、游国恩、郭沫若、徐祖正等都先后捐赠大批图书，最近美国哈佛大学方志彤先生又捐赠了外文书二万多册。我馆八十年的历史，也是我馆历代工作人员努力奋斗的历史，今天的北大图书馆是他们以自己辛勤的汗水浇灌而成的。今天到会的有我馆退休的老馆员和其他单位退休现在我馆工作的同志，我代表本馆全体在职的同志们向你们表示敬意。

在长期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我馆逐步形成了一些好的传统，这是我们馆生命力之所在，是我们所必须坚持和发扬的。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作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阵地的好传统。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李大钊同志主持我馆工作时，我馆成为这样的阵地，许多有志之士和爱国青年都曾在这里追求革命的真理。早期就有毛泽东、陈独秀、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李梅羹、范鸿劼等许多我党早期的战士和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来到北京，在我馆报刊阅览室任助理员数月。在职期间，他充分地利用我馆的馆藏，深入地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和许多有心振兴中华的学者和青年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后来他回忆说，“当我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在后来的动

荡的年月里，利用我馆的条件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有志青年就更数不胜数了。在反动阶级统治的旧社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是被禁止或受到极大限制的，在李大钊同志任职的北洋军阀时期和以后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校一些进步学生，先后组织过“亢慕义斋”和“平民图书馆”，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秘密的渠道搜集了许多革命书刊供师生们阅读。这些藏书现在也是我馆馆藏组成部分。解放以后，宣传马列主义成为公开而合法的事，我馆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就更多，效果也更为显著。仅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五年这四年间，我馆入藏的马列主义和新文化书籍就接近十八万册，其后还陆续有所增加。我馆还先后设立了新文化阅览室、马列主义著作阅览室等，为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我馆还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小型展览，向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进行思想教育。如近年举办过的展览就有“周恩来总理革命事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李大钊同志光辉的一生”、“一二·一学生运动”、“馆藏建党时期部分革命文献”等。我馆还在假期向学生推荐课外阅读书目。毫无疑问，我们今后仍然必须坚持和发扬这一好的传统，千方百计地加强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使我馆成为更好地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第二是努力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好传统。我馆作为一所高等学校的图书馆，为教学和科研服务是我们的职责。早在李大钊同志主持我馆工作的时候，他就明确地指出我馆不只是一个藏书的地方，而是要充分发挥书刊的作用，密切配合我校的教学工作，还指出我馆还应当成为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研究室。几十年来我馆工作人员在这些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入藏的书刊为例，三百五十万册藏书中包括了许多教学必需参考书，各种学术著作和一批

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善本、珍本，大体上能够满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这几百万册书籍的搜集、整理和保藏是我馆工作人员几十年来艰苦工作的成果。以服务工作来说，我馆很早就十分注意向学生提供教学参考书的工作，解放以后，更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和办法，基本上满足了教学上的需求。对于教师的研究工作，我馆工作人员也是尽可能地给以配合。北京大学之所以取得今天的学术地位，其中也包含了几十年来我馆工作人员的贡献。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四人帮”所造成的破坏，我馆服务工作的质量在一些方面有所下降。经过近几年调整服务体系，整顿目录，健全规章制度，进行服务思想教育，服务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然而和教学和科研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和一些管理和设备先进的图书馆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因此，今天，我们应当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我馆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好传统，以千方百计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千方百计地为读者服务作为我们工作的基本方针，努力提高我馆的服务质量，为北大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人材和出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而贡献力量。

第三是根据教学工作和科学发展的需要，从我馆实际出发，虚心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不断改革和前进的好传统。我馆八十年来所以取得一些成绩，靠的就是这种奋力前进，永不止步的精神。李大钊同志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时候，立志革新。他曾亲自带领我馆工作人员去当时新建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学习他们购书审批制度、书刊借阅办法和期刊索引的编制工作。他还和国外同行研究图书分类方法，毅然决定外文书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代替原有的四库分类法，其后，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马衡同志主持图

书部工作期间，中文书又采用皮高品十进分类法代替原有的四库分类法，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是很大的进步。李大钊同志还参考国外经验、主张开架阅览。解放以后，我馆同志也正是以这种进取精神，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加强了图书馆思想教育的职能，建立了提供教学参考书的比较完善的制度，按学科建立阅览室，修改了分类法。粉碎“四人帮”以后，我馆同志在恢复、整顿传统服务工作的同时，开展了参考咨询工作，开架阅览工作正在逐步发展。近两年利用国内引进的磁带和我国在香港的终端开展了电子计算机情报检索工作，定题通报的课题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二个，回溯检索的课题十六个。电子计算机应用方面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此外还开展了静电复印和缩微复制工作。尽管这些工作都还是刚刚开始，但这种不墨守成规，勇于学习和前进，而又力求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我馆这一好传统在同志们身上的体现。我毫不怀疑，只要我们坚持和发扬这一好传统，我们北大图书馆就必定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永保自己的青春。

同志们，我们馆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还要用若干年的时间去整顿十年内乱所造成的破坏，又要高质量地去完成我们的日常服务工作，又要向现代化建设起步，这三方面的任务同时落到我们这一代工作人员的肩上，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确信，我馆工作人员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广大读者的期望，振奋革命精神，发扬优良传统，继往开来，努力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不断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在党委和校长的领导下努力把北大图书馆办好。不久的将来，一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图书馆必将出现在燕园。

• 谢道渊同志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